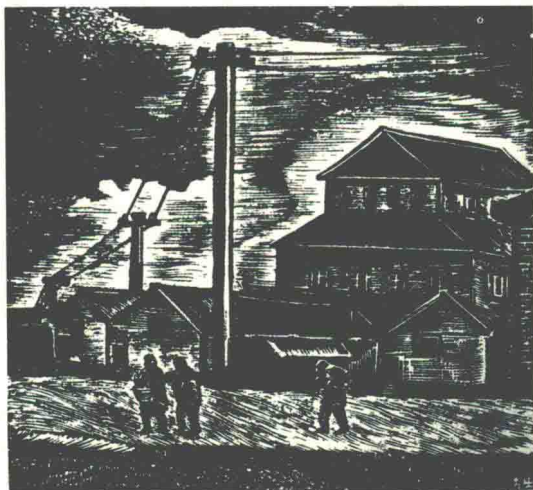


中国现代
文学馆
青年批评家丛书
第三辑

徐刚 著

虚构的仪式

同时代文学片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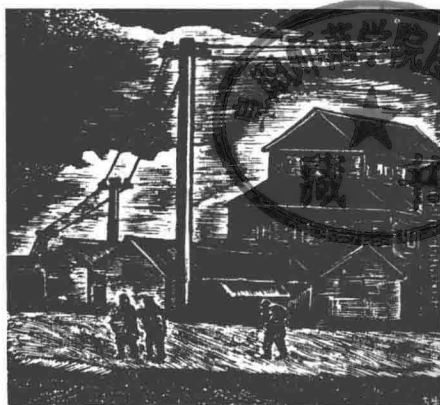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徐刚 著

虚构的仪式

同时代文学片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虚构的仪式：同时代文学片论 / 徐刚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3
(中国现代文学馆青年批评家丛书)

ISBN 978-7-301-27804-8

I. ①虚… II. ①徐… III. ①小说研究—中国—当代 IV.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90226号

- 书 名 虚构的仪式：同时代文学片论
XUGOU DE YISHI
- 著作责任者 徐 刚 著
- 责任编辑 李冶威 黄敏劼
-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7804-8
-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培文图书
- 电子信箱 pkupw@qq.com
-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 印刷者 三河市国新印装有限公司
-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 660 毫米 × 960 毫米 16 开本 18.5 印张 250 千字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 定 价 42.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丛书总序

中国现代文学馆是在巴金先生倡议和一大批著名作家的响应下，于1985年正式成立的国家级文学馆，也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文学博物馆。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主要任务是收集、保管、整理、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书籍、期刊以及中国现当代作家的著作、手稿、译本、书信、日记、录音、录像、照片、文物等文学档案资料，为文化的薪传和文学史的建构与研究提供服务。建馆二十多年以来，经过一代代文学馆人的共同努力，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事业不断发展壮大，现已成为集文学展览馆、文学图书馆、文学档案馆以及文学理论研究、文学交流功能于一身的综合性文学博物馆，并正朝着建成具有国际影响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资料中心、展览中心、交流中心和研究中心的目标迈进。

为了加快中国现代文学馆学术中心建设的步伐，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决定从2011年起在中国现代文学馆设立客座研究员制度，并希望把客座研究员制度与对青年批评家的培养结合起来。因为，青年批评家的成长问题不仅是批评界内部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对于整个青年作家队伍乃至整个文学的未来都具有方向性的问题。青年评论家成长滞后，特别是代际层面上70后、80后批评家成长的滞后，曾经引起了文学界乃至全社会的普遍担忧甚至焦虑。因此，客座研究员的招聘主要面向70后、80后批评家，我们希望通过中国现代文学馆这个学术平台为青年评论家的成长创造条件。经过自主申报、专家推荐和中国现代文学

馆学术委员会的严格评审，中国现代文学馆已经招聘了三期共 30 名青年评论家作为客座研究员。第四批客座研究员的招聘工作也已经完成。

四年多来的实践表明，客座研究员制度行之有效，令人满意。正如中国作协党组书记李冰同志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第二批客座研究员聘任仪式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那样，青年评论家在学术上、思想上的成长和进步非常迅速。借助客座研究员这个平台，通过参加高水平的学术例会和学术会议，他们以鲜明的学术风格和学术姿态快速进入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现场，关注最新的文学现象、重视同代际作家的创作，对于网络文学、类型小说、青春文学等最有活力的文学创作进行即时研究，有力地介入和参与着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实践，在对青年作家的研究及引领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作为 70 后、80 后批评家的代表，他们的“集体亮相”，改变了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格局和结构，带动了一批同代际优秀青年批评家的成长，标志着 70 后、80 后青年批评家群体的崛起。鉴于客座研究员工作的美好成效和巨大社会反响，李冰书记在第一批客座研究员到期离馆时曾专门作出了“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要进一步扩大规模”的批示。

为了充分展示客座研究员这一青年批评家群体的成就与风采，中国作家协会和中国现代文学馆决定推出“中国现代文学馆青年评论家丛书”，为每一个客座研究员推出一本代表其风格与水平的评论集，我们希望这套书既能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收获，又能够成为青年批评家们个人成长道路的见证。丛书第一辑 8 本、第二辑 12 本分别在 2013 年 6 月、2014 年 7 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后引起了巨大反响，现在第三辑 11 本也即将付梓出版，我们对之同样充满期待。

是为序。

吴义勤

2016 年夏于文学馆

目 录

丛书总序 吴义勤 5

第一章 批评的表情 1

- 一 “学院派”批评真的穷途末路了吗? 1
- 二 批判的重建:文化批评的未来 5
- 三 “微时代”文学批评向何处去? 12
- 四 意气用事无助于优良批评的形成 15
- 五 “茅奖”:“终身成就奖”的喜与忧 18

第二章 “谎言”中的“真实” 23

- 一 在“谎言”中发现“真实” 23
- 二 碎片、传奇与历史的魅影 27
- 三 检视近期乡土小说的寓言化策略 40
- 四 文学的“民族性”如何呈现? 46
- 五 中国科幻:走出去,以及如何走 50

第三章 历史的“野兽” 54

- 一 《老生》：历史的“野兽” 54
- 二 《回家》：不可能的归途 69
- 三 《炸裂志》：寓言中国的“实”与“虚” 76
- 四 《牛鬼蛇神》：先锋记忆的缅怀与溃散 85
- 五 《一句顶一万句》：追忆“讲故事的人” 94

第四章 时代的精神状况 100

- 一 《篡改的命》：绝望感，或虚妄的激情 100
- 二 《飘窗》：知识者角色与时代精神状况 109
- 三 《隐身衣》：“形”“质”分裂的时代 119
- 四 《风雅颂》：知识者的“逃离”与“回家” 126
- 五 《正午的供词》：“艺术之死”的时代隐喻 131

第五章 世相与现实 138

- 一 《问苍茫》：现实的追问与历史可能的祈愿 138
- 二 《蜗居》：中产阶级的“贫困”及其他 144
- 三 《石榴树上结樱桃》：如何讲述乡村的故事 150
- 四 《天堂蒜薹之歌》：现实的激愤与批判的证词 155
- 五 《沉重的翅膀》：作为一种历史态度的改革文学 161

第六章 新潮的力量 167

- 一 薛忆沔：内心的风景 167
- 二 邱华栋：城市的“精神现象学” 171
- 三 蒋一谈：城市内心的“深描” 177
- 四 阿乙：屈辱而荒谬的灰暗人生 186
- 五 徐皓峰：“新武侠”的风格和意义 192

第七章 同时代文学片论 197

- 一 “80后”写作：一个话题的诞生与消亡 197
- 二 郑小驴：虚构的诱惑 201
- 三 吕魁：纯真与世俗的辩证法 211
- 四 南飞雁：世俗生活与官场叙事 220
- 五 陈崇正：云山雾罩半步村 228
- 六 飞氲：“奇点时代”的“故事新编” 236

第八章 新女性的面向 242

- 一 张悦然：告别“青春期写作” 242
- 二 孙频：苍凉卑微的“剩女”爱情故事 245
- 三 马金莲：农事诗，或苦难中的温情 256
- 四 宋小词：隐忍与告白 264
- 五 蔡东：卑微者的隐痛 274

第一章 批评的表情

一 “学院派”批评真的穷途末路了吗？

在文学批评方法各显其能的今天，批评文体的差异本无足轻重。具体而言，无论是学术论文体，还是鉴赏随笔体，或者其他什么体，文学批评的有效性并不因外在在样式的不同而发生根本的改变。这便应了那句老话，“杀猪杀屁股，各有各的杀法”。很难说批评文体本身孰高孰低，只能说其来有自，特点不一，而高低的关键只在于运用这种方式的具体个人。但颇为奇怪的是，在如何获得文学批评的“在地性”与现实感的诸多讨论中，唯有“学院派”批评，因其鲜明的形式特征，而往往成为人们反思批评文体问题时的众矢之的。

在系统清理“学院派”批评的是非功过之前，我们可以比较粗略地确定这种批评的三个要素，一是批评者的学者身份，二是批评中的学理性，三是写作时的学术规范与专业化特征。即从批评主体来看，它注重的是完整的学院教育和正规的学术训练；从批评方法来看，它更注重知识、学问的谱系化，更强调批评的理论视野和知识结构；从批评风格来说，它大多是谨严、庄重的论说体，而很少用散漫、自由、活泼的印象体。而就当代文学而言，“学院派”批评家其实主要是由就职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当代文学教研工作者构成，“他们或者有着较好的文艺理论根基，或者有着深厚的现代文学功底，他们的文学批评

更多地体现出文学研究的特质，在话题的选取与论题的阐述上，也相对地以沉稳扎实见长。研讨当代文学中一些相对稳定的现象与一些比较重大的问题，是他们的强项之所在”。^① 概而言之，“学院派”批评意味着理性、严谨、引经据典的特征，它力图建立批评者与学者的双重身份，保持与商业、政治、社会体制的一定距离，而寻求批评的独立意义。然而在今天，“学院派”批评往往又被指责走得太远，以至于脱离现实，只局限于学术化的小圈子，这便构成了如今问题的缘由。

其实法国著名文学批评家阿尔贝·蒂博代在他的代表作《六说文学批评》中，早已指出了以大学教授为主的职业的批评的主要特征。一方面是优势，体现出批评者良好的学养、系统化的知识、宽阔的视野以及持论较为平和、学理性强等特征。另一方面则是不足，如重规矩规范、沉闷的学究气、缺乏敏锐的艺术感觉等。看得出来，蒂博代似乎对以大学教授为主的“职业的批评”颇有微词，而后来者对于“学院派”批评的理解与探讨基本沿此思路展开。

目前批评界对“学院派”批评大多持质疑的态度，指责“学院派”批评“搬弄西方学术名词，话语呆板、枯燥、乏味，行文程式化、规整化，学究气浓厚，堆砌时髦的学术名词却未击中要害，没有思想深度，没有锐气，没有鲜明的立场，没有独到的学术见解，没有对作品文本的针对性，行文空洞、沉闷”。而问题的关键则在于，“以学术规范为终极的学术目的，忽略了文学批评所应具有的思想、精神与灵魂”。^② 关于学院派批评的诸多弊病，我们通过期刊网的论文搜索可以得到印证。确实有大量的以研究为名的评论文章，将鲜活的文学论文写得面目可憎。这些四平八稳的学术论文，以高头讲章的姿态出现，多是为了应付职称评审，用评论者的话说，沦为“没有灵魂的学术消费品”。这些与内心生活和

① 参见白桦《文学的新演变与文坛的新格局》，“中国作家网”2009年9月19日。

② 参见陈竞、金莹《学院批评：如何批评，怎么说话？》，《文学报》2010年1月7日。

个人体验毫无关联的流水线式的生产模式，正在败坏批评的名声。

“学院派”批评的最大问题在于，批评的学理性空前加强，但批评的现实感却极大弱化。批评蜕变为从理论到理论，从文本到文本的游戏，而失去了现实的针对性，批评有时候会沉浸在单纯理论操练的欢悦之中，在纯粹阐释中迷失了批判性力量，而流于一种无效的分析。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江院长相继发表多篇长文讨论“强制阐释”的话题，他就中国文学批评对西方理论的膜拜，以及理论的误用所造成的批评失效等状况，进行了全面的清理，其目的在于致力于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话语重建。从“强制阐释”到“本体阐释”^①，张江所主张的是回到文本，回到常识，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我们常常开一个玩笑，聪明的评论家为了避免与评论对象交恶，而故意玩弄一些理论名词，将原本清晰的评论观点引向复杂，写出评论对象绝难读懂的批评文章，这看似异常高明深刻，其实非常巧妙地逃避了对于评论对象作品优劣好坏的评价和表态。这当然是“学院派”批评进入走火入魔状态的表现，但也确实是客观存在的普遍问题。尤其是考虑到目前多数批评从业者都在学院谋职，他们不得不服膺于学院教学和科研考核的基本原则，因而“学院派”批评几乎奠定了当前文学批评的主要形态，以至于当它出现问题的时候，问题本身也势必变得极为明显。

然而在此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产生的问题其实并不是“学院派”批评自身所带来的。作为一种批评方式，或者说学术建制，“学院派”批评的形成自有其历史原因。当今时代，“学院派”批评占据了主流，这也是1990年代以来学术转型的产物，文学批评的学院化与“思想淡出，学术突显”的社会现实密切相关，再加之1990年代以来海外汉学的影响，文化研究的冲击，年轻一代批评工作者所经受的教育和学术

^① 参见张江《当代文论重建路径——由“强制阐释”到“本体阐释”》，《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6月16日。

训练，使得学术化、理论化的批评模式成为文学批评的“新常态”，这也造成了当今文学批评的基本样貌。

尽管“学院派”批评目前还存在很多弊端，但一味指责学院派的诸多弊端，人云亦云地漠视它不可替代的优点，其实并不公平。比如作为“学院派”批评的对立面，媒体和网络批评固然有许多鲜活的东西，其自由与随意所塑造的“焦点”和“热点”往往也能牢牢抓住人们的眼球，但不可否认，其间大量充斥的吹捧灌水，粗制滥造的软文，以及哗众取宠的奇文，所表征的批评问题可能比“学院派”更加严重。所以问题的根本并不是文体的问题，而是批评从业者有没有用心投入的问题，用比较矫情的说法，是有没有带着批评者的体温和诚意。

因此可以说，批评不仅仅是要判断一部作品的好坏，或者仅仅乐于阐释，批评也是批评家借由认识这个世界，并经由身处的这个世界来反观自我的方式。通过文本阐释世界，进而在实践的层面探寻一种新的历史的可能。因此批评从来都不是判断或鉴赏某个作品，而是要进行细致入微的考察和分析，进而打开这个隐秘而荒谬的世界的一角。它面对的不仅仅是语言的纹路和肌理，虚构的世界里那些宽广而博大的人物内心，抑或如深渊般无比幽暗的人性本身，更要面对整个丰富而驳杂的外部世界，在更高的意义上阅读历史和社会。优秀的“学院派”批评，将个人的体验与对这个世界的理解，以及对美好未来的可能性的冀望，都渗透在文辞优美且饱含情感的文字之中。

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不可否认，“学院派”依然是批评的主力军，依然是批评活力的重要来源，其理论的穿透力，所带来的历史纵深感，所囊括的社会宽广度，其通过文本的细致阅读，精微的分析所达至的作品阐释力，并不是随感式的评论所能替代的。我们总是抱怨“学院派”批评的诸多弊端，但我们始终无法摆脱“学院派”批评的基本框架。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它仍将作为文学批评的基本样态出现。总而言之，“学院派”批评的重要性仍然无可置疑，“这不仅在于它在介

人创作、解读作品中显得更为内在和深入，还在于它以专业的性质和美学的品质在总体文学批评与文学活动中，无可替代地起着主导性与引领性的作用”。换言之，“就一种批评品质而言，以学院为基础的重视学理的话语方式”，依然是未来文学批评塑造自身的基本框架。因此我们基于反思的角度，对“学院派”批评的批评，并不是为了诋毁和消灭“学院派”，而是为了让它在重视学理的基础上，维持精神世界的“在场”，以便更积极地吸收其他文体批评的优点，参与社会热点与焦点问题的讨论。其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期待更有力量，更加诚实的批评。

二 批判的重建：文化批评的未来

熟悉文艺理论史的人大概都知道，文化批评的缘起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它有两个主要分支：一是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这一学派的文化批评家有一个显著的研究倾向，即把社会批判理论与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结合起来，他们由批判法西斯专制主义的文化工业入手，通过对各种文化现象的研究揭示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本质，进而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无情批判。另一个重要的分支便是英国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伯明翰学派长期致力于新的历史环境中工人阶级文化生存状况的研究，尤其重视工人阶级文化的异质性和复杂性。甚至注重由这种异质性而产生的“亚文化”所包含的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抗争和文化反叛意味。无论是哪个学派，作为社会整体的文化，都被置于研究和批评的重要位置。而在他们眼中，理论的生产性和阐释力，都是围绕文化而展开的。而这些批判理论与社会文化之间的积极互动，则保证了知识的“活性”状态，从而极大地改变了知识的整体面貌。这对于传统的文学研究无疑具有极大的冲击意义，因为无论如何，思索文化研究及批评的意义，都意在重申批评的政治维度，从而激活文学研究稍显僵化、沉滞的状态。

批评的泛化：从文学到文化

从历时来看，文化研究原来的学科基础是文学研究。这一点中西方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欧洲，最为活跃的文化研究学者，都曾是文学研究者。究其原因，可能与文学研究的方法太过发达有关。熟悉批评史的人，可以轻松梳理出这样的脉络：从新批评的细读，到结构主义和叙事学分析，从原型批评和精神分析理论，再到风靡一时的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等诸种后现代理论。文学研究的新方法、新观念层出不穷，而与此相反，经典的文学阅读却在离我们远去：文学似乎面临着“死亡”的危险。在这个后现代的传媒时代，文学日益“小众”，已然难以处理大众所关心的现实问题。因而文学批评便开始毫不安分地溢出文学之外，而直接面对文化这个“大文本”。这便正如文学批评家罗兰·巴尔特以文学的方式对照片、宣传画所做的卓有成效的解读。在巴尔特那里，文化意义上的批评，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神话”的批判，以及对整个社会文本的颠覆性阐释。或许就是在他的启发下，批评不再限于纯文学文本的解读，而是扩展到整个社会生活。从人的衣食住行到流行文化，从不同区域的文化形式到国族认同，文化研究几乎无所不在。一片蓬勃的情形似乎表明，只要站在所谓“文化”的立场上，所有的批评都有了言说的自由。

反观中国，文学批评向文化的“泛化”则有着更为深层的含义。现在看来，20世纪80年代文学批评的繁荣，其重要的依据在于，当时的文学占据了社会文化的中心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其实承载了当时整个社会政治想象的能量。从“伤痕文学”到“反思文学”，从“改革文学”再到后来的“现代派小说”，文学的发展与时代的轨迹紧密相连。在当时社会科学尚未建立的情况下，文学其实扮演着调动大众政治批判能力的角色，而批评也当然意味着那个时代的政治批评。直到90年代之后，文学才日渐失去了它的“轰动效应”。究其原因，

固然在于文学日益的“向内转”，在追求“文学性”的道路上，逐渐失去与社会的紧密关联。但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则在于，社会范围内学科专业体制的逐渐成熟，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建立，这无疑极大地屏蔽了文学的政治功能。在此，整个社会已然不需要通过文学的方式来实现政治想象，而自有其学科化的划分，因而文学研究失去其政治批判和社会想象的功能，而走向一种平实、冷静的史料索引和考据之风也就不足为奇了。文学与文学研究回到了社会给它派定的位置，然而问题在于，一方面文学自有其“小”，而“纯文学”更只是一条羊肠小道，但文学批评却早已无比发达，各种潮流层出不穷。批评之“刀”被各种理论学说锻造得无比锋利，但文学之小却实在让人扫兴。于是，批评开始跳出这些不争气的文学，而像罗兰·巴尔特那样，寻找自己合适的用武之地，以此重新激发批评的社会想象力。在这个意义上，按照文学的方式，对整个社会文本做文学意义上的解读，似乎成了一种当然的趋势和选择。

当然，“文化研究”的领域不可说不广袤，其活力不可说不蓬勃，但批评的“泛化”也容易招致一些问题，比如其外延的无限扩大，只要冠以“文化”的美名，都可成为批评的对象。其中最需警惕的便是“文化拜物教”，即在文化研究的知识生产与文化产业化之间形成的共谋关系。当今社会，文化的产业化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现实。这样的大背景下，文化研究被打上“粉红色”的标记便显得不可避免，这也是消费社会商品拜物教的逻辑所在。就像周宪教授所说的，“假如说文化研究落入权力/知识共生关系之窠臼具有某种知识政治学意义的话，那么，文化研究演变为文化产业的赞美者和吹鼓手，则揭橥了它蜕变为知识经济之附庸的可能性”。^①当然，商业操控固然是文化研究“产业化”的重要推手，但另一方面，官方基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所做的意

^① 周宪：《文化研究：为何并如何？》，《文艺研究》2007年第6期。

意识形态方面的顶层设计，也是值得政治批判意义上的文化研究予以高度警惕的。在此颇为反讽的是，当我们突然发现某位哈维尔理论的铁杆粉丝，居然能在一夜之间“蜕变”为重大课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当代大众文化的价值观研究”的主持人，我们就不难体会文化产业“恩惠资助”的魔力所在。因而，我们一方面要警惕文化研究在与知识/商品的共生关系中沦为推销商品和牟取利润的“思想库”，也要小心在与官方意识形态的合作生产里消解其批判性和对抗性。毕竟，确保文化研究的批判性才是恪守文化研究而非文化经济或文化政治研究的关键所在。

作为文学研究方法的文化批评

我们常说的文化研究除了指前文所提及的“以文学的方式解读文化”之外，另外在很大程度上则包括“以文化的方法阐释文学”。就后一种意义而言，指的是文学研究不再停留于文本本身的分析阐述，而是转向了政治、经济、思想的评论研究，以及由此而来的学科交叉“合围”。在此，以经典作品分析为基础的传统文学批评开始极为明显地转向以考察各种形式的文化实践为基础的文化研究。近年来，随着文化研究的日益蓬勃，这种模式不断受到学院派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的广泛追捧，这在极大改变文学批评面貌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问题。正如人们所指出的，文化批评的泛化使得文学研究独有的精细而微妙的审美特性大打折扣，因而一时间，各路方家也直言不讳地指责其存在的误区，诸如“理论先行，疏离文本”“大而无当，浮华无质”“不顾语境，盲目西化”，以及“无视规则，作秀媚俗”等言论不绝于耳。但批评虽然存在，文化研究已然成为“显学”，其方法成为当今文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却是不争的事实。其实客观来看，文化研究方法的文学批评并不是一次划时代的创造，按照希利斯·米勒的说法，它更像是一次“回归”，“回归到新批评派以前的旧式的传记、

主题和文学史的方法之上”。^①而且更重要的是，这种文学研究的趋向并不是完全排斥对文学的文本和语言的研究，只是更多地把这一内部研究置于文化研究整体中，使之成为整个研究工作的有机构成之一。也就是说，文化批评的方法内化在当今的文学研究之中，使得原本单调的研究模式呈现出丰富复杂的样态。

为了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我们或许有必要简要梳理一下英国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历史。其实真正对文化概念产生重要影响并对文化批评的形成产生关键作用的人，就是英国批评家马修·阿诺德和 F.R. 利维斯。在阿诺德那里，文化作为对美与智慧的追寻，最终将使人类获得完美的救赎。在他看来，只有文学或者最宽泛意义上的诗歌，才能推动他所称之为文化的崇高思想活动。在这个意义上，阿诺德将他的文学研究与文化理想有效结合了起来，从而扩展了文学批评的视野，使之具有了文化批评的意义。在他身后，利维斯比阿诺德走得更远。当阿诺德将文化作为抵制无政府状态的重要法宝时，利维斯公然宣称大众文明是一个不健康的社会，需要用经典文学予以疗救，进而在此基础上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因而他大力主张文学的社会批判作用，将文化批判视为“我们时代文明真正的潜在的力量”。然而，他的精英主义立场又是与阿诺德一脉相承的，因此他极为重视少数精英创造的价值判断对社会公众的影响。这种文化观念受到真正的冲击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作为后辈的雷蒙德·威廉斯在英国文学“伟大的传统”之外，对前辈的观点做出了修正。他以整体文化和共同文化为号召，开启了一个以“文化与社会”为主题的文学传统。他不再把文化看作高高在上的精神产物，而将其看作既包括经典更包括日常生活的一种全新价值形式。他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不断推崇一种作为“整

^① J. 希利斯·米勒：《文学理论在今天的功能》，参见拉尔夫·科恩编《文学理论的未来》，程锡麟、王晓路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年，第 122 页。